

修省者的畫像：善書筆下的黃正元與劉山英

游子安*

學者一般認為中國文化中「罪孽感」較輕，如徐復觀認為：「在中國文化中的『罪孽感』，是比一般宗教乃至比基督教要輕微得多。」究其原因，是儒家肯定生命及現世的價值，「對生命的自身，不認為是罪孽，於是原罪的觀念，自不能成立」¹。儒家著述與明清時善書都強調自省、慎獨，注重自我修養與道德自律。可是，基督教表明不靠自我修持以自救，而是上帝的救贖。就善書來說，也不乏「紀過」、「悔罪」等懺悔書寫傳統的資料²。艾伯華 (Wolfram Eberhard) 在其《傳統中國之罪與過》一書中，引用筆記、戲曲，以及《玉歷》、《太上寶筏》等善書，說明地獄與罪罰的觀念在中國人心目中所占的分量，認為中國是一個具有「罪惡感」的社會³。吳百益著〈中國傳統中的自我檢討與懺悔罪行〉一文，指出明末清初士大夫在懺悔中表現出的罪疚感，與基督徒的懺悔相差不遠，若與宋儒的樂觀論相比，則有天壤之別⁴。十七世紀中葉以前，自陳改悔之文以南朝沈約 (441-513) 〈懺悔文〉為代表。然而，明末以來這類懺悔文較多見；除了較為學者注意的功過格外，以修省、懺悔為主調的善書，包括康熙年間彭定求校訂刊行《文昌玉局心懺》、乾隆年間輯成的《全人矩矱》收錄〈悔罪說〉、咸同年間徐謙輯《恐懼修省

* 游子安，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文化學系兼任助理教授。

¹ 詳見徐復觀：〈中國文化中的罪惡感問題〉，原載《華僑日報》（1968年9月），後收入蕭欣義編：《徐復觀文錄選粹》（臺北：臺灣學生書局，1980年），頁216-219。

² 宮川尚志引用《暗室燈》等善書探討恥與罪的觀念，參考〈近世善書の恥と罪との觀念〉，《中國宗教史研究》（京都：同朋舍，1983年）。

³ Wolfram Eberhard, *Guilt and Sin in Traditional China* (Berkeley: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, 1967)，另參劉靜貞書評，載《食貨》復刊第9卷第3期（1979年），頁41-43。

⁴ Pei-yi Wu, "Self-Examination and Confession of Sins in Traditional China," *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* 39.1 (1979): 26, 36-37.

錄》⁵、民初陳廷英編《勸善書目提要》其中一類為「省克類」，介紹《修省良規》、《治心篇》、《日省錄》等五種⁶。

宋明以來善書著者，大約可分為兩類：首先是託名神仙或神祇降筆而成，如《太上（老君）感應篇》、《文昌帝君陰騭文》、《太微仙君純陽呂祖師功過格》；也有善人撰著，如劉山英纂輯《信心應驗錄》、余治纂《得一錄》，而袁黃是第一位具名的善書著者。袁黃的《陰騭錄》由〈立命之學〉、〈謙德之效〉、〈積善〉、〈改過〉四篇構成，一般稱為《了凡四訓》，是一篇自傳式的勸善文，乾隆此篇輯入《修省錄》一類善書⁷，流傳至今歷久不衰。《了凡四訓》亦備受推崇：「乃奉行《感應篇》、功過格之骨髓。……如精金美玉，為明代鉅文，非僅泛常勸世文可比。」⁸ 乾隆年間彭紹升說：「了凡既歿百有餘年，而功過格盛傳於世，世之欲善者，慮無不知效法了凡。」⁹ 清代善書的著者，如趙熊詔、黃正元、劉山英等人，仿效袁黃，把自己修省應驗的始末完整地記錄下來，以勸人改過遷善。一些善人，在其編著善書的序文中，細述他們從誦讀善書，藉奉行功過格痛改前愆，最後編印善書勸世，更得到善報。其中康熙、乾隆年間黃正元，仿效前賢，寫了修省始末的自述，可說與明代袁黃的〈立命篇〉與俞都〈遇灶神記〉¹⁰ 二文前

⁵ 修省即修持省察，《易經·震卦·象》曰：「洊雷震，君子以恐懼修省。」《恐懼修省錄》筆者未見，清代勸善文常勉人恐懼修省，冀回天怒。徐謙輯著善書，包括《桂宮梯》、《關帝覺世真經闡化編》、《一心普度合編》、《物猶如此》、《恐懼修省錄》多種，見〔清〕雙全：〈藝文〉卷9之1，《廣豐縣志》（南京：江蘇古籍出版社，1996年據同治11年刊本影印），頁410。

⁶ 陳廷英編：《勸善書目提要·自序》（武昌精華印書館承印，1924年湖北省立武昌圖書館藏），頁1-3a。

⁷ 劉山英提到乾隆37年「同邑貢生涂君名昌爵，糾同志刊佈《修省錄》一書，余展視之，見有袁了凡先生立命之說」。〔清〕劉山英輯：〈信心應驗錄敘〉，《信心應驗錄》（乾隆59年濟寧居士李隆臣重鐫，大英博物館藏），卷1，頁1a。

⁸ 佚名：〈重刻了凡四訓跋〉，〔明〕袁了凡撰，尤雪行註，印光鑒定：《尤註了凡四訓》（香港：彩虹印刷公司，年分缺載），封面有1922年尤氏「謹告」一段話語。

⁹ 〔清〕彭紹升編：〈袁了凡傳〉，《居士傳》（揚州：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，1991年），卷45，頁8。

¹⁰ 俞淨意即俞良臣，明嘉靖萬曆年間人，七科不中，年四十潦倒益甚，後遇灶神明示，遂誓愿痛改前非，實行善事，自別其號曰「淨意道人」，誌除諸妄，如是三年（萬曆二年），俞良臣年五十歲，即舉鄉薦，萬曆五年中進士，因作〈遇灶神記〉以警世。俞淨意先生〈遇灶神記〉一文，多種善書都有收錄，見劉山英：《信心應驗錄》，卷7。

後互相輝映。像黃正元與劉山英般詳細的自白，成了一類具特色的傳記文，是中國文化之中懺悔書寫傳統的實例。本文主要分成五部分，首先簡述明末清初改過遷善的時代思潮，然後指出黃正元、劉山英是上承袁黃、顏茂猷勸世度人的傳統；第三、四部分別述論黃正元懺悔自述及纂輯善書借己以勸人；最後從〈夢徵備錄〉看修省者得神夢示痛改前愆的歷程。

一、明末清初自省悔過思潮

善書兼融儒家道德內省與陰騭觀念、佛家的因果報應及道教的積善銷惡思想。內省與慎獨是儒家的道德修養論，孔子提出君子「內省」，「內自訟」；《禮記·中庸》、《大學》篇要求君子「慎獨」、「毋自欺」。漢末道教初興時也有省過的方法，太平道與五斗米道主張以符咒為人治病驅邪，「有病自首其過」¹¹，所謂「首過」即自己陳述所犯過失¹²。道教徒用「守庚申」這種「神道設教」的辦法來傳播相當於儒家「自省」、「自反」或「慎獨」的修養論。因此，修養的理論不限於儒家一派，道教的功過格與佛家無不如此¹³。

明末清初士大夫面對革故鼎新的動盪局面，內心夾雜著驚懼、悲戚和懺悔，從劉宗周的《人譜》、黃淳耀的《自監錄》¹⁴，到清初李塨的《訟過則例》皆然。其中李顥(1627-1705)提出的「悔過自新」說，是對明清政權更迭進行沉痛反思的產物¹⁵。「過」即「身心過失」，「苟有一念，未純於理，即是過，即當悔而去之」；

¹¹ 〔西晉〕陳壽撰，〔宋〕裴松之注：《三國志·魏志·張魯傳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2年點校本），第1冊，卷8，頁263。

¹² 太平道與五斗米道設靜室，使病者處其中思過，向神靈祈福求安，悔罪首過，詳參土屋昌明：〈後漢における思過と首過について——自伝文學との關連を考えるためと——〉，《道教文化への展望——道教文化研究會論文集》（東京：平河出版社，1994年）。

¹³ 余英時：〈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〉，《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》（臺北：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，1987年），頁39-40。

¹⁴ 一些為明朝殉節的士人，平生已重視日省己身，如守嘉定的黃淳耀(1605-1645)在家鄉參加慧香社的慈善組織，為督責自己，著《自監錄》：「每日所為，夜必書之，兼考念慮之純雜，語言之得失。」見〔明〕黃淳耀：《陶菴全集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2年《四庫全書珍本》第12冊），卷19，頁1a。

¹⁵ 有關李顥及他揭櫫的「悔過自新」說，參見陳祖武：《清初學術思辨錄》（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1992年）。

「新」意為「復性」：「新者，復其故之謂也」，使人本性復回到「至善無惡」的境界：「悔而又悔，以至於無過之可悔；新而又新，以極於日新之不已。」¹⁶ 明末清初功過格一類善書特別盛行，這個現象與同時期士大夫間反省和自訟的風氣密切相關。晚明以來修省冊籍的流行，或對朝代更迭進行反思，或置之案頭，使過可日寡而德可日新。

天啟、崇禎年間講學會流行，呂妙芬研究陽明學賴以傳播的社會組織——講會，致力於省過。如江西安福惜陰會一類，以簿記方式自省功過，以省過為目的的聚會，在方法上受到功過格的影響¹⁷。顏茂猷在龍溪創立「雲起社」，討論儒學、詩文、釋道、經濟等，分成樹品、經濟、博雅、脩真及善緣五會¹⁸。茂猷在一六二五年落第返鄉「設會講學，從者如雲」¹⁹。明末清初陸世儀、陳瑚、盛敬、江士韶太倉四君子在崇禎九年結成一個學習小組，稱他們的學習小組從事「遷善改過之學」²⁰。陳瑚（崇禎十五年舉人）入清以後隱居不仕，定日紀考德法，整理規範實踐而成《聖學入門書》，附有〈論日省善過〉、〈善過紀法〉，敘述善過計量方法²¹。

明末清初有大量省過書的出現及省過會的組成，除了遷善改過成了晚明王學一個主要論題外，講學會與善會也受當時民間宗教提倡功過格的風氣激盪²²。從

¹⁶ 〔清〕李顯撰，陳俊民點校：〈悔過自新說〉，《二曲集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6年），卷1，頁5-6。

¹⁷ 詳參呂妙芬：《陽明學士人社群：歷史、思想與實踐》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，2003年），頁94-95。

¹⁸ 酒井忠夫：〈顏茂猷の思想について〉，《鎌田博士還曆記念歷史學論叢》（東京：鎌田先生還曆記念會，1969年），頁266-267；另見 Cynthia Brokaw, *The Ledgers of Merit and Demerit: Social Change and Moral Ord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* (Princeton, N.J.: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, 1991), pp. 222-223。

¹⁹ 〔明〕鄭仲夔：〈品雋〉，《雋區》（崇禎3年刻本），卷1，頁1a。有關晚明的講學會、民間的結會及善會，參考陳寶良：〈明代的社與會〉，《歷史研究》，1991年第5期，頁142-147；陳寶良：《中國的社與會》（杭州：浙江人民出版社，1996年），頁313。

²⁰ 詳參吳震：《明末清初勸善運動思想研究》（臺北：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，2009年），第8章。

²¹ 〔清〕陳瑚：《聖學入門書·自序》，收入《叢書集成續編》（臺北：新文豐出版公司，1989年），第62冊，頁349；〈大學日程〉，頁357-358。

²² 在部分王學信徒中，省過改過是一個熱烈的論題，像江右王門的鄒守益說過「遷善改過，即致良知之條目」，詳參王汎森：〈明末清初的人譜與省過會〉，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》第63期第3號（1993年7月），頁688-689。劉宗周弟子憚日初等結成「續證人社」，

一六二〇年到一六七〇年，至少出版了十部新的功過格²³。部份士人用「功過格」作為反省方法，或設會講學以遷善改過。崇禎四年至五年這段時期，祁彪佳與顏茂猷往來密切，祁氏「手書功過格八條」（崇禎四年十二月五日），十二月十一日「顏壯其至，與之商再定功過一格」²⁴，如雲起社即以功過格為綱領文獻，其中一條會約：「入會者俱以功過格十萬善為準，各置功過簿，憑心報錄，會日出之，以相儆察。」顏茂猷在天啟年間創立此社，《迪吉錄》由幾十社友參訂，各會所用功過格，亦可能收入《迪吉錄》之中²⁵。《迪吉錄》為現存明末功過格的代表作，《太上寶筏圖說》提及《迪吉錄》一書在清代盛行情況：「讀其書而悔過遷善，學道成真者，不知幾千百人也。……《迪吉錄》一編，關係萬世人心不細，此書大江南北今猶盛行。」²⁶

清初善書對善惡、過失與悔罪等觀念展開深入的討論，特別是功過格這類善書。功過格的源流，要從功過思想說起。中國的功過思想起源甚早，《易經》說：「積善之家，必有餘慶；積不善之家，必有餘殃。」《太平經》則沿用這種「承負說」。道教和民間信仰認為天地、灶神、司命等神，監察人的善惡並給予應得的賞罰。功過格以數量計算善惡的行為及記功的做法，並以果報之說動人邀福之心，也有批評為機械式及利心太重。祿宏改編《太微仙君功過格》而成《自知錄》（1604年序），內容以「善門」和「過門」分類，《太微仙君功過格》所稱的「功過」，《自知錄》則稱為「善過」。言「善過」或「功過」而不言「善惡」也有其深意，實顧及修省者的感受，康熙年間成書的《彙纂功過格·緒言》對「惡」與「過」作如下區分：

不曰「善惡格」，而曰「功過格」者，對天立言，而賞罰因於斯，禍福因於

其所定約誡，大多是一些讓人改過自新的記錄，陳寶良指出這些講學會「顯然已受到當時流行的善書如功過格一類的影響」，見陳寶良：《中國的社與會》，頁320。

²³ 包筠雅 (Cynthia Brokaw)：〈明末清初的善書與社會意識型態變遷的關係〉，《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》第16期（1993年9月），頁35。

²⁴ 見〔清〕祁彪佳：〈涉北程言〉，《祁忠敏公日記》（北京：書目文獻出版社，1988年），頁17b-18a。

²⁵ 酒井忠夫：〈顏茂猷の思想について〉，《鎌田博士還曆記念歴史學論叢》，頁267-268。

²⁶ 《太上寶筏圖說》（光緒18年上海千頃堂書局刊本），卷2（弟字），頁24b，引徐謙《太史感應堅信錄》。案：《太上寶筏圖說》又稱《太上感應篇圖說》，略稱《太上寶筏》，嘉慶年間重刊將《太上寶筏》八冊按孝、悌、忠、信、禮、義、廉、恥八德編次。

斯爾。抑「過」非「惡」之謂也：惡者有意爲之，過者偶然犯之……我輩正坐犯過之病。大抵功過格，必爲惡人所不喜，如照魔之鏡……。²⁷

吉岡義豐認為：

功過思想是中國思想的特色。……在民間使用「功過」這個名詞，有軟化的作用，比起「善惡」這兩個字來，要顯得含蓄多了，不會直接刺激一個人的情感。²⁸

如前所述，李顥認為宋明以來各種道德修持主張，「要之總不出『悔過自新』四字」，而開中下人遷善之門的是功過格一類善書及託名扶鸞而成經書。康熙十三年(1674)文昌帝君降乩於長洲彭定求(1645-1719)家，書訓文三篇，心懺一部，彭氏校訂刊行《文昌玉局心懺》，此書全稱《文昌玉局證真宣化救劫酬恩心懺註解》，題「玉局真君杜長春奉元皇帝君律令降乩敬撰」，「雲間道德心壇諸子註、長洲後學彭定求校訂刊」，書後有康熙四十三年(1704)彭氏撰跋²⁹。《呂祖全書》收錄呂祖序言：「見元皇命真官成此心懺，整巾肅容，再拜而讀之不釋。」以是書「懺一卷共十章，杜長春仙官專為士子演」³⁰。此書本於孟子正人心之義，示以省身克己之道，以為改過遷善之助，雖以懺名，可視為「訟過語錄」：

玉局曰：吾作此書，本於孟子正人心之義而已。曷爲乎亦以懺名？因俗本《文昌懺》，語涉禱祈，與《四書》、《五經》中省身克己之訓離矣！非儒生所宜誦述也，吾故以此書易之，亦謂從心上做功夫者方可云懺，而紛若史巫無庸也，敬天尊聖，並提而論，必由悔過入門，而序次工夫，總歸於知行合一、内外交持，乃得幽明洞徹焉。³¹

全書分皈誠、首罪、赦過、省幾、定志、篤行、養性、化物、事天等章。第二章〈首罪〉要人「自首厥罪」，認為罪惡之源在於後天環境之習染，表明與劉宗周

²⁷ 《彙纂功過格》（康熙49年刊本）。有關道家區別和意識功過的想法，詳見酒井忠夫著，許洋生譯：〈功過格的研究〉，《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3年），卷7，頁500-505。

²⁸ 中村元等監修，余萬居譯：《中國佛教發展史》（臺北：天華出版事業公司，1984年），中冊，頁710。

²⁹ 《文昌玉局心懺》（光緒5年廣州多文堂重刊本）。黃子律先生後人家藏。

³⁰ 〈文昌帝君玉局心懺後序〉，《呂祖全書》（越南養真書館1918年版，香港雲泉仙館藏經閣藏本），卷3。

³¹ 《文昌玉局心懺》書前，頁6。

「訟過法」、「改過說」互相契合：

玉局曰：皈誠之後，便如身在帝天之側，一些子瞞不過，若曰：「吾本無罪。」是謂自欺。……人之初生，皆有不慮而知之良知，不學而能之良能，原是潔潔淨淨，完完全全之體。倏焉而習染喪之，遂為天地間一罪人。……《感應篇》中臚列諸惡，亦既詳矣。……袁了凡作功過格，亦可有庸俗勸勉。念臺劉子謂其涉於計功謀利之漸，實遠於道，更著《人譜》一編，所列微過、隱過、顯過、大過、叢過、成過等項，而終以訟過之法，改過之說，則首罪之真實處也。³²

劉宗周在《人譜》中對道德修養的要求非常嚴格，孫念劬(1742-?)於乾隆年間輯成《全人矩矱》，孫氏自言繼承劉宗周慎獨自省之說：「昔劉念臺先生作《人譜》，欲學者證其所以為人，而首揭夫證心之學。其下手工夫，全在慎獨。夫獨而不慎，即是閒居為不為善也。小人閒居為萬惡淵藪，君子慎獨為記性根源。茲集所編，於檢身治心，敦論利濟之事無不備具。」³³《全人矩矱》收錄〈悔罪說〉一文：

天之於人，猶父之於子，方其過也，疾之甚嚴，及其改也，又喜其自新。人果痛改前非，力行從善，天未有不原而宥之者。謝上蔡曰：「天道禍淫，不加悔罪之人。」蓋天地不絕人以自新之路，神明亦開人以遷善之門。……故《易》曰：終有大敗，至於十年不克征，此迷復之所以凶也；見善則遷，有過則改，此風雷之所以益也。天下至迅疾者莫如風雷，故聖人以此為遷善改過之象。人須豎起精神，從今為始，迷魂網一拳搥碎，陷入坑一脚踢翻，暗室屋漏，痛自刻責，《易》曰：震无咎者存乎悔。即夫子所講內自訟也。……今浮薄少年，若已犯刑邪，亟宜痛自猛省，勿謂我已失德，終於自暴自棄……然亦不得恃有悔罪之門，而故犯淫邪之行。無論有心故犯，必不能悔罪遷善，即果能自克，雷厲風行，鏤心刻骨，然光陰迅速，日月如流，一番墮落，復一番振刷，受盡折磨，歷盡艱辛，邀得上帝回心。……故我第願人勿犯於前，更自勝人追悔於後……。若夫悔而弗改，改而弗力，或悔而即改，

³² 〈首罪〉，《文昌玉局心懺》，頁 16b-17a。

³³ 〔清〕孫念劬輯：《全人矩矱》，收入胡道靜等主編：《藏外道書》（成都：巴蜀書社，1994 年），第 28 冊，頁 300。乾隆 55 年孫念劬在〈弁言〉解釋是書命名：「欲全其人，則入乎矩矱之中，弗出乎矩矱之外。」「全人」意指道德完美人，「矩矱」意思是規則法度。孫氏又說：「欲去惡而入于善，則矩矱不可以不立，矩矱立而後人可全也。」

改而復犯，則皆為真惡。怙過不悛，天人共棄，斯固無可復禳者矣。³⁴

善書常強調容人改過自新，嘉慶年間輯成的《暗室燈》亦說：「天神以改過期人者，……若不准其自新，則人將以為前過莫追，後善無益，終成廢棄矣。故聖人不絕有過，而責其不改，……故改過宜勇。」³⁵ 清代流行的《玉歷鈔傳》，書名「玉歷」是善惡紀錄簿的意思，卷首標題為「玉帝慈恩纂載通行世間男婦改悔前非准贖罪惡玉歷」。嘉慶年間彭允秀、陸喬木輯《聖經匯纂》，第四冊收《玉歷鈔傳警世》、《玉歷懺悔》、《玉歷夢驗》、《玉歷轉禍為福》等篇³⁶。

二、善書著者的譜系：從袁黃、黃正元到劉山英

在勸化施濟的工作上，江南善人也有一脈承傳的意識。清代如蘇州崑山的周夢顏、長洲彭氏、吳縣潘功甫與無錫的余治都繼承了江南善人勸世度人的傳統。江蘇太倉人葉裕仁指出其承傳關係：

吳江袁黃氏生明之季，以禍淫福善之說化人，人從而化之。郡中彭氏生重熙累洽之世，衍其緒論，於時民物滋豐，風俗敦樸，故其設施猶未廣。及道光中，人心日壞，民生日蹙，……（潘功甫）宗淨土之教，以之修己而勸人，於是刊布善書，廣行施濟，……於是蓮村余君亦行其道於澄江梁溪之間。……³⁷

江南一些家族，世代家學相承般編纂善書，例如彭定求著《元宰必讀書》、兒孫彭啟豐、彭紹升重訂《活閻羅斷案》、《關聖帝君全書》等³⁸。善書著者也可編成

³⁴ 孫念劬輯：〈戒淫集說〉，《全人矩矱》，卷2。〈悔罪說〉文末記述此文增刪節錄自《雲路先聲》，收入《藏外道書》，第28冊，頁358。

³⁵ 〔清〕深山居士輯：《暗室燈·前議》（封面題《繪圖暗室燈》）（上海：宏大善書局，1915年），頁8。

³⁶ 有關《聖經匯纂》，參見拙著：《善與人同——明清以來的慈善與教化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5年），頁21-23。

³⁷ 光緒元年葉裕仁所作〈余孝惠先生年譜跋〉，見〔清〕余治：《尊小學齋集》（光緒9年得見齋刊本）附。參考拙著：《勸化金箴——清代善書研究》（天津：天津人民出版社，1999年），頁99。

³⁸ 詳參拙文：〈論清代江蘇長洲彭氏家學、善書與善舉〉，《大陸雜誌》第91卷第1期（1995年7月）。

「譜系」³⁹，〈流通善書說〉一文，臚列了清初至咸豐年間撰著印送善書、皆集福延年者共十一人：

古今來撰著善書、纂輯善書、刊布善書、印施善書，因而消災度危、集福延年者，紛紛不可勝數。即近如顏生愉章敬、潘仲謀成雲、何蒼玉士瑗、彭凝社定求、陳榕門宏謀、朱石君珪、關柱生槐、黃泰一正元、劉喬松山英、徐白舫謙、李更生承福諸先輩，皆以流通善書而得位、得祿、得名、得泰則甚矣，流通善書之有益於世道人心也匪淺。⁴⁰

上述諸善書著者，包括康熙年間顏生愉刊《丹桂籍》、潘仲謀輯《陰騭文註證》、何士瑗輯《陰騭文注釋》、彭定求著《元宰必讀書》、陳宏謀輯《訓俗遺規》、朱珪為《太上感應篇》、《全人矩矱》等善書作序⁴¹，關槐增註《丹桂籍》，為《文帝全書》撰序；劉山英纂輯《信心應驗錄》、徐謙著《桂宮梯》、《關帝覺世真經闡化編》等善書；李承福編《同善錄全書》⁴²等。其中康、乾年間的黃正元，不僅在善書勸化上有貢獻，更值得注意他寫了修省始末的自述，使我們對清代善書著者的信仰及奉持功過格的實況有更深入的了解。

三、黃正元的懺悔自述：「天降鞠凶，是誰之過歟？」

黃正元，福建羅源人，康熙至乾隆年間人（？-卒年在乾隆二十三年 [1758] 之後），癸巳（康熙五十二年，1713）武會試中式第二名進士，官至浙江處州鎮總兵。《羅源縣志》載黃正元嗜儒書、建育嬰堂：

黃正元，字泰一，號松菴。……武藝精強，而性嗜儒書，在軍中藹然一儒者，……為營中立義學，……處州風俗生女鮮育，正元建育嬰堂，貧家婦收畜之，月視兒肥瘠為賞罰，又建田為長久計。凡其所為皆武職中所罕觀，

³⁹ 王夔立輯《覺後編》卷首「引據書目」五十四部，「撰人考略」共八十一人。這八十位撰人，如顏茂猷、劉山英、李承福、余治，約一半是善書著者，《覺後編》有扼要考略。見王夔立輯：《覺後編》（臺北：世界紅卍字會臺灣省分會，1979年），頁11-34。

⁴⁰ 〈流通善書說〉一文，《暗室燈》、《感應篇圖說》等多種善書皆見收錄。

⁴¹ 朱珪：〈感應篇序〉、〈全人矩矱序〉，見《藏外道書》，第28冊，頁296。

⁴² 有關《同善錄全書》，詳參酒井忠夫：《增補中國善書の研究》（東京：國書刊行會，2000年），下冊，頁203-213。

所至有令聞焉。⁴³

黃正元受明代俞都、袁黃等前賢的啟發，嘗為己過，「深自愧悔，力行功過格以改前愆」，撰有修省始末的自述。黃正元於《愆海慈航》跋言自稱：「少時犯戒，中歲知非，既始迷而終悟，欲借己以勸人。」⁴⁴ 現所見《太上寶筏》「胡不勉而行之」一句案語，收錄黃正元所寫〈自記稿〉，他自白：「一生所歷，由困而通，由險而夷，無子而復得子，……叨典封疆。……迴思數十年來，日凜先大夫庭訓，諄切捧誦太上感應真言，身體力行，始終不倦，得以享有今日之榮。」⁴⁵ 光緒年間張之萬(1811-1897)選輯清朝人物嘉言懿行而成《熙朝人鑒》，其中「回心向道改過自新」條目即引用黃正元例作說明。

黃正元生長於武將家庭，父黃英，號穎公，「以征臺功加左都督」，官至福建金門總鎮，《陰騭文註》「修善修福」句引為案例：「居官清慎，無一事不準情酌理，無一時不愛軍恤民。生正元，少年登康熙癸巳進士。」⁴⁶ 黃英「綏輯地方，威立惠行，臺地軍民亦立祠祀之」，長子正元、次子正清、三子正綱。黃正綱歷任江南、浙江、廣東三省提督。黃正綱之子光鑽曾任福建水師提標遊擊⁴⁷。因為累世軍功，乾隆三十九年(1774)朝廷在下梅嶺為岐後村黃氏三代立「世受國恩」坊⁴⁸。黃正元嘗言：「自弱冠時，先大夫即以《感應篇》垂訓，曰：此脩身立命之本原，超凡入聖之階級。」及後言行奉為圭臬，「敬謹奉持，見女色項下列諸惡孽種種報

⁴³ 黃英、黃正綱傳，見〔清〕盧鳳琴修、林春溥纂：〈人物〉上，《道光新修羅源縣志》（上海：上海書店，2000年），卷19，頁22。

⁴⁴ 〔清〕黃正元：〈跋〉，《愆海慈航》（臺北：廣文書局1981年），頁1a。

⁴⁵ 《太上寶筏圖說》，卷8（恥字），頁47a。

⁴⁶ 《陰騭文註》「修善修福」句，黎貴惇編輯，明命二十年(1839)據桂堂原本印行，卷1，頁46a。書後頁76至88有序跋多篇：越南景興四十二年(1781)黎貴惇〈陰騭文註題詞〉、乾隆二十六年(1761)沈德潛〈丹桂籍元序〉、廖鴻章〈丹桂籍元序〉、景興四十三年(1782)黎仲庶〈新輯陰騭文註後序〉、景興四十二年裴輝壁〈新輯陰騭文註跋〉。案：是書乃黎貴惇主要據黃正元《丹桂籍》（合《性天真境》、《愆海慈航》、《御虛階》三帙成書）及乾隆四十一年宋思仁輯舊註本增刪而成，見黎貴惇：〈陰騭文註題詞〉，頁76b。此書藏本簡介，見王小盾、劉春銀、陳義編：《越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》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，2002年），頁559。《陰騭文註》此書，由李豐楙教授複印見贈，謹此致謝。

⁴⁷ 黃英、黃正綱傳略，見盧鳳琴修、林春溥纂：〈人物〉上，《道光新修羅源縣志》，卷19，頁22-24。

⁴⁸ 盧鳳琴修、林春溥纂：〈城池〉，同前註，卷8，頁19。

應，不禁悚然，立願誓不敢犯」⁴⁹。黃氏在《感應篇圖說凡例》中指出先改過才談得上積善功：「經文所載善行善報不過三十餘條，而惡行惡報則有一百六十餘條，是知功易積過難除也。持是經者，雖積善功，不先改過，則功不掩過，難得福報。」⁵⁰ 這位武官自言少時犯色戒，後見《呂祖功過格》，遂立誓痛戒。康熙五十一年(1712)奉行功過格，仕途轉為順利。後宦遊山右，復犯前戒，閩中三子及妻相繼逝世。康熙五十二年(1713)黃氏「癸巳萬壽恩科，忝捷南宮挑選侍衛，隨侍禁庭」，仍持誦《感應篇》。後宦遊山西，孑身獨處，復犯前戒，閩中次子、三子、七子連殤，元配郭氏亦亡，正元潦倒萬里外，幾於不振，自嘆：「天降鞠凶，是誰之過歟？」《熙朝人鑒》詳載其際遇：

舉武榜後，每遇邪緣，不能自持。己丑、壬辰〔1709、1712——引者〕兩躓。一日友人以《呂祖功過格》贈，見女色條下臚列罪款，不覺汗下，立誓痛戒。……是歲癸巳(1713)中一甲二名進士，……後宦遊山右，偶犯前戒，三子連妖〔夭〕，妻郭氏亦歿。……〔雍正辛亥(1731)——引者〕重行功過格，刊送《感應篇圖說》，誓滌前愆，癸丑(1733)繼室舉一子。⁵¹

雍正八年(1730)他遷職江蘇，「每憶疇昔之失，深自愧悔，力行功過格以改前愆」，兩年後繼室及妾各生一子，及後八子光琦周歲患症甚危，正元焚表告天，其子霍然頓癒。黃正元遂刊刻《玉皇經》、《金剛經》、《陰騭文圖說》及《太微仙君純陽呂祖師功過格》等善書，並分別於雍正十二年及乾隆二年(1737)寫上題識。同年也纂輯《文昌孝經》。之後宦途順利，他「調任西江、巴蜀，再任江左，遷官河協」，歷任江西南安營參將、江南河標副將，及後升任浙江處州鎮總兵官。晚年奉行功過格益力，刻《崇修匯覽》勸世。乾隆十九年(1754)光琦病逝，黃正元「益痛自追悔，覺淫邪之事，雖未敢犯，即言語戲謔，亦干天怒，洵可畏也。因而發願，力行三千善事，祈光琦仍投母腹」，繼妻李氏「以四十八歲近老之婦、二十二年不曾生育」，於乾隆二十年生第十子。是年衙署失火，黃正元一家安全逃出，《陰騭文》與《功過格》諸板藏於小瀛洲書屋皆未損傷。「雖當被燼之餘，猶願勉

⁴⁹ 《太上寶筏圖說》，卷8（恥字），頁46a。

⁵⁰ 《太上寶筏圖說·凡例》，頁8。

⁵¹ 〔清〕張之萬輯：《熙朝人鑒》（光緒20年滇省務本堂刊本），下集，卷2，頁42，「回心向道改過自新」條。

捐廉俸，謹刊《感應篇圖說》」⁵²。

黃正元以自己的經歷，引證改過遷善，篤志力行者，可轉禍為福：「晚年奉行〔功過格——引者〕益力，刻《崇修匯覽》勸世，帝君亦屢降乩於署中，逐事指示如嚴父明師。自後宦途坦然，兩次陞遷。夫公之前後互異若此，善惡之報捷如桴鼓，洵可畏哉。」⁵³ 楊志道為《感應篇圖說》撰序，講述黃正元仕宦經歷「垂四十年，戢兵綏民，功烈卓卓可紀；而利物濟人，如散藥療疾、捐貲育嬰諸善事，指不勝屈」⁵⁴。文昌帝君屢降乩於署中。雍正辛亥（九年，1731）「降鸞於洋河公署，逐事指示」，洋河即江蘇省泗陽縣洋河鎮。帝君將以往乩示彭定求之言再告之：「今爾黃子正元，奉吾日久，造次顛沛，未嘗廢禮。予故以昔日之告彭子者，再為子告焉。……」文昌帝君訓言：「子近來記功錄過，總是逐事操存，未免煩苦，不見有為善之樂。吾今示汝以提綱挈領之法。……一在修身，修身之道，先戒口過。……一在齊家。……」⁵⁵ 帝君又贈聯，書於黃正元辦事之所，其一聯云：

職任河漕，欲兩事無忝，道在勤敏清慎；

權統士卒，冀千人盡服，端由教育撫綏。

從其自述文可知，黃正元任武官四十年，奉行功過格亦四十載，期間他的仕宦從困頓到坦途，兒子夭殤，又復得子，個人經歷由危轉安，都跟其力行善事與編印善書扣上關係。他纂輯刊印《陰鸞文》與《感應篇》的註釋書，孜孜不倦二十年，離不開功名子嗣的期望。

四、黃正元纂輯《功過格》與《感應篇》借己以勸人

黃正元纂輯善書，主要是雍正至乾隆初年（特別是 1734-1737 四年之間），較晚是乾隆二十年（1755）刊行的《感應篇圖說》。黃正元崇信文昌帝君、呂祖諸神，《今文古文金剛經合刻》書前有乾隆元年呂祖序言：「門下士黃子正元憫世人但誦

⁵² 黃正元自述，見《太上寶筏圖說》，卷 8（恥字），頁 47a，另參考《御虛階》，見〔清〕汪澹森撰：《聖學入門》（道光 26 年李會元堂刻本，廣州中山文獻館藏），頁 35-36，所附《（新刊）御虛階》。

⁵³ 汪澹森撰：《聖學入門》，頁 36。

⁵⁴ 《太上寶筏圖說·舊序》，頁 3b。

⁵⁵ 〈帝君寶訓〉，《陰鸞文註》，頁 62、67a 及 64。

經文，不曉經義，請直解於予，……黃子之功，將與佛土並永。」⁵⁶ 黃正元曾得呂祖乩示須設法禁止盜墓罪行：「黃正元備員河南，與淮揚道朱象乾同詣呂祖師壇，蒙批示云：死者之有棺木，猶生人之有屋宇。郊外之人，每乘夜盜挖，……」期望「有地方之責者，發慈悲心，設法禁止，功德無量矣！」⁵⁷ 黃正元捐俸刊布善書：「正元性喜善書，每遇昔人嘉言懿行，必繕寫展誦期與同志共勉。歷年來已將《太微仙君功過格》、《玉皇本行集經註解》，《金剛經註解》、《心經註解》及今《帝君陰騭文圖說》、《帝君孝經》、《帝君戒淫說》先後捐俸付梓，公諸善信。」⁵⁸ 就筆者所知，黃氏纂輯善書，有以下多種：

（一）雍正十二年（1734）編纂《御虛階》，是書又名《太微仙君純陽呂祖師功過格》，有雍正十二年黃正元序，黃氏纂輯《御虛階》這部功過格，是參照雲谷禪師傳授袁黃之作，他歷仕江南，公務之暇，重加校訂，黃氏據之懺罪行善⁵⁹。

（二）雍正十三年纂輯《性天真境》，是書原名《文昌帝君孝經》，將《文昌帝君孝經》、《勸孝寶訓》及《孝順報應》合編而成⁶⁰。

（三）乾隆二年（1737）纂輯《陰騭文圖說》，題黃正元纂輯，其弟正綱參閱，黃正元兒孫等參與⁶¹。

（四）乾隆二年纂輯《慾海慈航》。他採先正格言，暨古今善惡報應附於《戒淫寶訓》卷末，纂輯而成《慾海慈航》⁶²。

（五）乾隆二年纂輯《配命錄》，即《帝君戒士子文》；及後王華亭增輯釐訂成《治心篇》，道光年間刊刻⁶³。

（六）乾隆二十年（1755）增註刊行《感應篇圖說》⁶⁴。

⁵⁶ 《今文古文金剛經合刻》（香港：玉清別館，1992年重刊）。

⁵⁷ 《陰騭果報圖注》（上海：天寶書局，1929年據光緒17年上海點石齋刊本），頁40，「施棺槨免屍骸之暴露」句案例。

⁵⁸ 黃正元編：《陰騭文圖說》（道光17年重鐫），「印造經文」條。

⁵⁹ 筆者所據是汪澹森撰《聖學入門》所附《（新刊）御虛階》。

⁶⁰ 《性天真境》，筆者所據是臺灣新竹市中華文藝服務社1977年重印本，江蘇常郡公善堂藏板。

⁶¹ 《陰騭文圖說》（光緒年間北京晉文齋刊本，天津圖書館藏）。

⁶² 黃正元纂輯《慾海慈航》有〈文昌帝君序〉（乾隆2年）及黃氏跋語。

⁶³ 陳廷英編：《勸善書目提要》，第3冊，頁2，「省克類」。

⁶⁴ 有關黃正元纂輯《感應篇圖說》及其清末刊本，詳參酒井忠夫：《增補中國善書の研究》，下冊，頁112-125。

黃氏晚年纂輯《感應篇圖說》一書⁶⁵，此書自乾隆年間廣泛流行，光緒十五年上海仁濟善堂石印改名《太上寶筏圖說》刊行，成了清代後期流通《感應篇圖說》的祖本，近年臺灣等地也有重刊此版本⁶⁶。箇中原因是用辭較淺顯，晚清善書普遍繪圖，黃氏在圖說善書的發展上實起了推動作用。乾隆二十年楊志道推許是書「博採古今善惡之報，著為論案，繪之圖像，繫以詩章」，認為是書「流布自枯蒼始，俾所部士民，咸知心解力行，以之為善而改過，即以之錫福而免罪」⁶⁷。通過其修省應驗的始末，黃正元以力行功過格改過自新的經歷，引證天人感應之理歷驗不爽。黃正元這篇自述文，可視為清朝武官奉持功過格的現身說法。黃正元之前，重印此書者計有梁化鳳、王繼文、郝玉麟等人，酒井忠夫認為《感應篇圖說》在閩浙、雲南等地區武官之間刊行流通。王繼文，康熙年間雲南巡撫；郝玉麟，乾隆初閩浙總督⁶⁸。光緒年間重刊本對此有清楚說明：「此編創始於雲間許鶴沙，康熙中滇撫王公刊於滇，乾隆中制府郝公頒於閩浙，其後閩中黃總鎮正元復加纂輯。」⁶⁹善書強調居官最易積德累功，黃正元亦以《感應篇》為居官箴誡：「經文大旨，雖合上下通勉，而為居官箴誡者尤多。蓋人有官職，一言一事關係匪輕，則為功為罪亦匪輕，……得福得禍，豈同於匹夫編戶之列。」⁷⁰像黃正元般的清代官員篤信《感應篇》，居官言行奉善書為圭臬，在檢束身心與利物濟人方面起了惕勉的作用。

其中，《太微仙君純陽呂祖師功過格》自清代流行至今，民國初年是較普遍

⁶⁵ 《感應篇圖說》堪稱清代圖說善書的代表作，正如 Catherine Bell 所言，只有少數善書可在一個區域網絡以外廣為流傳，《感應篇圖說》與惠棟的《感應篇箋注》卻例外地突破地理隔閡，而黃正元的增註本共收入 96 種其他善書的材料。例如徵引《感應篇集注》、《覺世篇注證》、李更生《同善錄全書》等善書。此書經黃氏纂輯，遂燦然大備。詳參 Catherine Bell, "Printing and Religion in China: Some Evidence from the Taishang Ganying Pian," *Journal of Chinese Religions*, 1992, p. 183, note 35。

⁶⁶ 佛教團體亦有重印此書，並附白話註解，《太上寶筏圖說》（臺中：青蓮出版社，1977 年據光緒 15 年上海仁濟善堂印本）。近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將黃正元《感應篇圖說》列入「中國傳統文化讀本」出版，參見張兆裕編著：《太上感應篇》（北京：燕山出版社，1995 年）。

⁶⁷ 《太上寶筏圖說·舊序》，頁 3b。

⁶⁸ 酒井忠夫：《增補中國善書の研究》，下冊，頁 122。

⁶⁹ 何增慶：〈佛山重刻感應篇圖說敘〉（佛山鎮仰善堂光緒 16 年重梓），頁 1。

⁷⁰ 《太上寶筏圖說·凡例》，頁 8。

流通使用的一種功過格⁷¹。明末清初祿宏《自知錄》、《太微仙君純陽呂祖師功過格》與《文昌帝君功過格》，是香港、臺灣佛道社團仍然重印有數的幾種功過格⁷²。《太微仙君功過格》等功過格被陳霞稱作「操作性道教善書」，通過細緻的計算，簡便的操作，「使人們日復一日地努力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善事」⁷³。以下劉山英的自述，可說明得神夢示、痛悔前愆的修省歷程。

五、劉山英的修省歷程：淨念與應驗

劉山英(1733-1806)，湖南益陽人，字喬松，別號淨念，官至浙江溫州衛守備。劉山英在〈信心應驗錄敘〉及〈夢徵備錄〉詳述其修省積善應驗的始末，及多次有神降示夢徵的事。較早注意劉山英的學者是吉岡義豐，吉岡義豐以劉氏為地方上的小官，奉行功過格及投身於善書的事業，稱為善人階層的典型⁷⁴。

劉山英痛改前愆，始於四十一歲時回想「平素所犯過業不少，且放肆成性」，於是仿效袁黃、俞都前賢，每日誦讀《感應篇》、《陰騭文》、《般若心經》等三教經文，又填《太微功過格》，奉行濟人利物之事⁷⁵。為了改過從善，遵行功過格。乾隆三十八年(1773)之後數年，「其捨財作福，費至十數千文之善行，悉皆勸眾共舉，而用己貲獨行者，一文至數文則有千餘條，百文至數百文僅數十條，費數千文者，止三條耳」，這些費錢功德包括「老弱殘疾者，給以一文至數文，疾病死亡，孤寡無依，旅邸缺費者，或助以百文至數百文」⁷⁶。劉氏雖然悔過遷善，但其

⁷¹ 平野義太郎：〈支那における郷党の社會協同生活を規律する民族——道德功過格を中心として——〉，《法律時報》第15卷第11號（1943年），頁9。

⁷² 《太微仙君呂純陽祖師功過格》（香港：抱道堂，1986年重印本）。

⁷³ 陳霞：《道教勸善書研究》（成都：巴蜀書社，1999年），頁56。

⁷⁴ 吉岡義豐：《現代中國の諸宗教——民眾宗教の系譜——》，收入《アジア佛教史・中國編》（東京：佼成出版社，1974年），第3冊，頁100-106。有關劉山英及其《信心應驗錄》，參見拙著：《勸化金箴——清代善書研究》，頁48-49、頁66-68。

⁷⁵ 劉山英：〈信心應驗錄敘〉，《信心應驗錄》，卷1，頁1b-2。《信心應驗錄》共10卷，大英博物館僅存卷1及卷8。Robert Kennaway Douglas, *Catalogue of Chinese Printed Books, Manuscripts and Drawings in the Library of the British Museum*（《大英博物館所藏漢籍目錄》）（東京：科學書院，1988年），頁137。

⁷⁶ 劉山英：〈信心應驗錄敘〉，《信心應驗錄》，卷1，頁3b-4。

信念並非堅定不移。乾隆四十一年他在北京捐納聽候選用，卻流落京師，遂起退悔之念，後得神（文中描述是「道者」、青袍道冠人）夢徵而滌慮洗心，誦經不輟，翌年獲委官職。但居官後，又起貪淫忌妒之念，乾隆四十二年以後幾年，南北奔馳，復無積蓄，官途蹇滯，母子分離。乾隆四十七年又有夢徵，「自此發憤，自責益深。……乃移往古開元寺，謝絕人事，每日按課誦經，暇則纂輯《信心錄》」，兩年後領金山運，再過一年迎養母親於金山⁷⁷。張之萬輯《熙朝人鑒》記述劉氏體行功過格，持之有恒並獲福報載：「效袁了凡式，一念善惡，每日必記，初則功不勝過，漸漸功多過少。自是母久病愈，享高壽。先生歷官江西江南二十年，嘉慶丙寅，無疾而終。」⁷⁸ 劉氏對「淨念澄心」曾經歷過掙扎，而別有一番體會和心得，認為誦經到念頭不動時，定有效驗：

余於癸巳元旦誦經時，未能無心，母病倍篤。誦至數月，念頭不動，而余母三十餘年之病一旦而痊。甲午秋，歛貨貿易，自湖北至南安，迺遭萬狀，余誦經之念，百折不回，而有除夕之夢。丙申夏，銓職京師，幾至流離，得神夢而滌慮洗心，誦經不輟，即獲奇遇，得官迎養，皆如神言。及壬寅以後，初誦《太上》等經，猶有母老遠離之念營擾於心，厥後誦《金剛》，一切念頭不動，真求即無求，惟知誦經而已。而所遇乃益神，所獲乃益利，可知祈求為善，務當心不著於求、不著於善，而誦經到念頭不動時，自有靈驗。⁷⁹

劉氏情急之下，甚至曾嘗試利刃刺心之法：「妄念時起時伏，……總不能洗心滌慮，以致母病倍篤。復手持利刃，誓若再有妄念相纏，余即刺心而死，至是妄念始息，而母患三十餘年之病症，自此永除矣。」⁸⁰ 劉氏修省歷程簡表如下：

⁷⁷ 劉山英：〈夢徵備錄〉，同前註，頁 26a、頁 28-29。

⁷⁸ 張之萬輯：《熙朝人鑒》，下集，卷 2，頁 46，「一切善事信心奉行」，此書將劉山英字喬松，誤作松喬。

⁷⁹ 劉山英：〈信心應驗錄敘〉，《信心應驗錄》，卷 1，頁 30a。

⁸⁰ 〈補錄淨念澄心真訣〉，見劉山英：《信心應驗錄》，卷 1，頁 43a。

年 代	修省歷程／奉行功過格／善書著述	資料出處／備註
乾隆十五年 (1750)	益陽縣附學生，屢試不第。	王夔立輯《覺後編》 ⁸¹ 。
乾隆三十七年 (1772)	販賣蓮子虧本，四十一歲時家產漸耗。是年始仿效袁黃、俞都等前賢，悔過遷善，誠心祈禱，每日誦讀三教經文，又填《太微功過格》，奉行濟人利物之事。	
乾隆三十八年 (1773)	元旦上疏悔罪，每日跪誦《太上》、《文帝》、《觀音》、《準提》各經咒，以祈母壽，及己身名祿。	
乾隆三十九年 (1774)	除夕得夢徵。	
乾隆四十一年 (1776)	變賣家產，銓職京師（捐納聽候選用），流落京師，遂起退悔之念，後得神夢徵而滌慮洗心，誦經不輟，翌年獲委官職。	
乾隆四十二年 (1777)	署理南昌印務，及後領運江西廣信。	劉氏認為乃應前夢。
乾隆四十五年(1780)起	劉山英纂輯《信心錄》，乾隆四十七年又有夢徵，「自此發憤，自責益深……乃移往古開元寺，謝絕人事，每日按課誦經，暇則纂輯《信心錄》」。	十年後《信心應驗錄》刊刻告成。
乾隆四十七年 (1782)	又有夢徵，神訓分明。	
乾隆四十九年 (1784)	領金山（江蘇鎮江）運，迎養老母。	
乾隆五十四年 (1789)	劉山英撰〈夢徵備錄〉。	
乾隆五十六年 (1791)	劉氏捐廉在蘇州刊刻《信心應驗錄》，付梓一千餘部。	
乾隆五十七年 (1792)	調浙江溫州衛前幫繁缺例。	以上資料引自劉山英輯《信心應驗錄》卷一〈信心應驗錄敘〉、〈夢徵備錄〉 ⁸² 。
乾隆五十九年 (1794)	濟寧居士李隆臣於得一部，以是書「實關身心性命之旨，大有裨於世教……於濟寧再鐫全板，是板遂在山東流傳」。	大英博物館及俄羅斯俄國科學院藏本，即為第二刻，陳師灝、陳師濂校 ⁸³ 。

⁸¹ 王夔立輯《覺後編》卷首「撰人考略」中，《信心應驗錄》著者：「劉喬松，名山英，湖南益陽縣附學生，乾隆中，歷官南昌溫州衛守備。」（頁32）。

⁸² 劉山英：〈夢徵備錄〉，《信心應驗錄》，卷1，頁22b-27、頁29b-30。

⁸³ 《信心應驗錄》現存多見為乾隆59年李隆臣刻本，如魏安(Andrew C. West)編：《Catalogue of the Morrison Collection of Chinese Books》（《馬禮遜藏書書目》）(London: University of London,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, 1998), p. 213。俄羅斯俄國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藏《信心應驗錄》（乾隆59年淨念堂刊），10卷10本，見《俄國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藏書中國木刻本收集目錄》（莫斯科，1973年），頁147。

嘉慶十一年 (1806)	劉山英逝世。	
嘉慶十三年 (1808)	劉燦為了實現父親的遺志，發行此書第三刻，並撰〈繼承父志序〉。	
嘉慶十五年 (1810)、 光緒五年 (1879)	福建省甌寧縣余小山、江蘇省金壇縣冉玉庭先後重刻《信心應驗錄》。	吉岡義豐藏本 ⁸⁴ 。

除了改過從善的信念曾經動搖，劉氏對三教的態度和信仰，也經過轉變歷程。劉氏未閱《內典》之前，受老師陳振武影響，訾議釋、道二氏⁸⁵，認為佛教有傷倫理，不足以訓世。後來留心《藏經》，大為改觀，以其「修行設教，皆本忠孝節義，盡性盡倫，為修真悟道之根本，始信三教流通，理歸一致」⁸⁶。乾隆四十八年劉氏得《金剛經》一部，每日持誦，並把《金剛經註釋原真》等備載於《信心應驗錄》卷九、卷十。因為他認為此經治心之法，至精至微，所以收進其善書叢書之內⁸⁷。乾隆五十七年，劉氏調任浙江，前往歸安縣呂祖堂，得《呂祖全書》一部，認為此經為修真悟道之本，摘呂祖經旨數十餘言補入《信心錄》中，「以證明是籍所論三教歸一之理為不妄云」⁸⁸。劉氏誦讀三教經文，認為二氏既切合儒家修身立命之學，且奉持修行，獲報靈驗。他在〈信心應驗錄凡例〉開首說明「是冊纂輯聖諭帝訓、儒釋道三教心傳妙法，以成一籍。……是冊惟將聖諭居首，次及《太上感應篇》、《清靜經》，次及文帝、關帝諸訓。此外諸聖真以及理學名賢訓言，則隨文敘列」⁸⁹。

《信心應驗錄》是一部大型的善書叢書，共分十卷，收善書一百五十種，堪稱總善書之大成。自乾隆四十五年起，劉山英「即纂輯《太上》、《文帝》各經註證註解」，及後入住開元寺誦經輯書，十年後刊刻告成。吉岡義豐指出，此書初刻於湖南益陽淨念堂⁹⁰。濟寧居士李隆臣於乾隆五十九年得一部，以是書「實關身心性

⁸⁴ 吉岡義豐：《現代中國的諸宗教——民眾宗教の系譜——》，頁 100。

⁸⁵ 劉山英：〈斷疑論〉，《信心應驗錄》，卷 1，頁 12a。按：此文節本收入另一本善書《暗室燈》之中，頁 28。

⁸⁶ 劉山英：〈闢邪闡正說〉，同前註，卷 1，頁 19a。

⁸⁷ 劉山英：〈夢徵備錄〉，同前註，卷 1，頁 29a。

⁸⁸ 劉山英：〈補錄大士降筆偈言〉，同前註，卷 1，頁 31。

⁸⁹ 劉山英：〈信心應驗錄凡例〉，同前註，卷 1，頁 8。

⁹⁰ 吉岡義豐：《現代中國的諸宗教——民眾宗教の系譜——》，頁 100。

命之旨，大有裨於世教，……於濟寧章文定齋刻字書坊內再鐫全板」⁹¹，是板遂在山東流傳。劉山英的願望是出版一萬部，吳門與山左兩次共刊印了二四六〇餘部。他逝世後，劉燦為了實現父親的遺志，在嘉慶十三年(1808)發行此書第三刻。劉氏父子編纂善書亦廣結善緣，乾隆五十六年《信心錄》刷印布送，劉山英聞鎮洋汪氏累世積善，汪學金（乾隆四十七年進士，1747-1804）在里中創舉放生施貧等會，劉氏「往請謁，並以是錄導焉」，汪氏推許《信心錄》，向劉氏取數部施送里中好善之士，並推薦彭紹升與論淨念澄心要訣。劉氏「先以是錄呈教」，過了幾個月（乾隆五十七年），劉、彭二人相聚討論淨念之法⁹²。彭紹升推許說：「讀《夢徵錄》，知足下篤信因果，好善有誠，現身指點，足與俞袁兩公記述，互為左證。……」⁹³

六、小 結

袁黃在一五六九年受教於雲谷禪師，堅信功過格並身體力行，及後中進士，《了凡四訓》於一六〇七年刊行，可視為修持功過格的典範。劉山英讀此文，「始知袁公科第、子嗣、壽考皆本於雲谷禪師之教，由修省而致也」⁹⁴，與劉山英悔過遷善寫成的《夢徵錄》相若，清初還有冒辟疆(1611-1693)撰〈夢記〉，全文講功過感應之理，作為幼弟冒裔刊刻《感應篇》篇後的證例。〈夢記〉一文寫於一六三八年，距袁黃〈立命篇〉有三十多年，對冒氏行功過格影響尤深：「行善格以蓮池大師、了凡先生為主，小為增減。」⁹⁵袁黃經歷著述影響所及，自清代至民國年間效法者甚夥，趙熊詔號曰「學了」⁹⁶；曾國藩讀《立命說》，改號曰「滌生」；聶雲

⁹¹ 李隆臣：〈誌〉，見劉山英：《信心應驗錄》，卷1，頁7a。

⁹² 〈補錄淨念澄心真訣〉，同前註，卷1，頁43b-46。

⁹³ 彭紹升於會面後曾撰〈與劉喬松〉，見彭紹升：《一行居集》（臺北：新文豐出版公司，1973年），卷4，頁25-26。

⁹⁴ 劉山英：〈信心應驗錄敘〉，《信心應驗錄》，卷1，頁1a。

⁹⁵ 詳參李孝悌：〈儒生冒裏的宗教生活〉，《昨日到城市：近世中國的逸樂與宗教》（臺北：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，2008年），頁147-154。

⁹⁶ 趙申喬(1644-1720)曾刻《惜字果報錄》，在常州創設惜字會；兒子趙熊詔著《感應篇注訓證》，康熙48年中狀元，武進趙氏科第不絕，善書咸稱惜字之報。詳參閻湘蕙編輯，張椿齡增訂：〈趙熊詔〉，《國朝鼎甲徵信錄》卷2，收入周駿富輯：《清代傳記叢刊》（臺北：明文出版社，1985年），第17冊，頁168-175。

臺則題字「勉學俞公淨意，追隨袁氏了凡」自勉。近代教育家蔣維喬 (1873-1958) 深受《了凡四訓》薰陶，認為「這一生的做人處世，不致於放肆，完全靠這部書的根基」，他自述：

我記得年紀十五六歲的時候，身弱多病，先君叫我看《了凡四訓》，我看了大大的覺悟。……總覺得這部書，好得了不得。就把他的功過格，劃成小冊子。把每天一言一動，照樣記起來，每夜結算，每月總結，每年底一大結。做了兩三年，的確過日少、功日多，向來浮躁的氣質，也大大的改變了。如今想起來，這一生的做人處世，不致於放肆，完全靠這部書的根基。⁹⁷

總括而言，黃正元與劉山英受袁黃立命學說啟迪，藉奉行功過格而痛改前愆，並編印善書勸世，得位得泰，成了清末《熙朝人鑒》「回心向道改過自新」、《陰鷲果報圖注》等善書果報案例。黃正元、劉山英諸位修省者所寫的自述文，既與俞都、袁黃勸善文互為佐證，也讓我們得以瞭解清人的懺悔實錄，實是中國文化之中懺悔書寫傳統的具體說明。

⁹⁷ 蔣維喬：〈序〉，黃智海撰：《了凡四訓白話解釋》（香港：香港佛經流通處，1988年重印本）。蔣維喬 (1873-1958)，曾任職北京教育部、江蘇省教育廳廳長等，著《中國佛教史》等書。